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YUEDI XUESHU
SIXIANG LUN

越地学术思想论

梁涌 著



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王建华 主编

越文化研究丛书



YUEDI XUESHU
SIXIANG LUN

越地学术思想论

梁涌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吕 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地学术思想论/梁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越文化通论)

ISBN 978-7-01-009077-1

I. ①越… II. ①梁…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浙江省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804 号

越地学术思想论

YUEDI XUESHU SIXIANG LUN

梁 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125

字数:27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077-1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王建华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



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就越文化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将越文化的核心区划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是比较妥当的。这块地区，亦称“越中”。绍兴，原名会稽，大禹时立的名，秦统一中国后，设会稽为郡，唐改会稽郡为越州，南宋绍兴元年，高宗南渡，驻跸龙山，命改州为府，冠以年号，即为绍兴。元、明、清三代均称绍兴（路、府）。关于绍兴府的范围，在清代，“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①。

越文化的基本区是古越国领土比较稳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浙江省因浙江（今名钱塘江）而得名。古越国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浙江流域。《越绝书》载：“越王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②又说，越王句践兵败后与大夫文种、范蠡去吴宫为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③。又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楚威王兴后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越文化的边界区是越文化基本区周围的地区，它曾属于古越国的版图，也曾属于其他诸侯国的版图。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则是清楚的。因此，即使我们将越文化的核心区确定在今绍兴地区，越文化的基本区确定在今浙江省地区，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越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禹。据《史记·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

① 吴悔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

② 袁康、吴平：《越绝书·勾践入臣外传第七》。

③ 同上。

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大禹死后传位子启，夏朝开始。据史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①此是越的开始。不过，此时的越，虽有了大禹的宗庙，尚只是地，不是国，据《吴越春秋》：“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②少康封无余于越，意味着越有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位君主。无余传世十多代后，因“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③。十几年后，有奇人出，自称是无余之后，指着天空，向着禹墓，说着鸟语，立志要“复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④。顿时，凤凰翔集，万民喜悦。大禹之祭恢复，越国开始强大。

大禹是中国古代全民族共同尊崇的帝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的实际奠基人。越文化源于禹，说明越文化不只是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地域文化之一支，而且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在地域文化中，越文化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比如名士辈出，清人吴悔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用了八个字概括越文化的特点：“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关于“英贤”，吴悔堂《越中杂识序》说：“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菁华之彦。”毛泽东有诗咏越，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虽然中国大地到处都出人才，但人才出得多、档次高、历代不中断，形成一种名士文化现象的，大概只有越了。

又如文武兼融。从越文化源头古越国历史事迹看，它是尚武的，后人概括其精神为胆剑精神，胆剑精神之剑，意味着勇猛进击。这种尚武的精神，发展为革命的精神，在近代反清革命中表现得鲜明突出。虽然越文化中有尚武的一面，但是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重文，此地出的文人多，在儒学、佛学、玄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再比如道器并重。道学代表人物明有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承前启后，脉系分明；实学是道学之外别一种学术^⑤，此派重经世致用，古越有范

① 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将陈亮与叶适说成是“道学外的思想家”，见该书第56章。

蠡、文种、计倪,重农倡商,开其先河,南宋有陈亮、叶适开宗创派。从而充分见出越文化道器并重的特色。

研究越文化,最早始于东汉,代表性事件是袁康、吴平整理《越绝书》。《越绝书》是越人在越世系断绝以后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一部地方史书,袁康、吴平整理此书,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成果来看,除《越绝书》之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越绝书》无疑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人的著作。^①其后,这种研究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成果。

越文化研究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关于越文化的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80年代以来,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同时借助于考古的发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也大量出现,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一如越文化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有关越文化的研究也是个没有尽头的学术之路。

我们认为,今后越文化研究需注意以下三点:一、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越文化是历史形态,但其发展则为现实形态。对越文化,我们不能只做历史的研究,也应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注重从越文化的历史形态中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代有价值的启示。二、单项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在单项研究上,我们过去做得比较多,整体研究相对较弱。三、多角度地研究。文化,本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应是多角度的,目前我们的越文化研究,角度还不够丰富。

^① 参见陈桥驿:《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本丛书名为“越文化通论”，就是试图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做一些新的探索。

本通论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建立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综合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方法，从纵横两个角度全面揭示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真相和丰富内涵，并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分析越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述越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越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特殊价值。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这套论著要在各卷次的专题探讨上保持前沿性，体现独特性，拓展越文化的研究领域，争取在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越文化的发展演变、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地特有的经济思想和行为模式、越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特征、越地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越地文学艺术成就、越地方言和民俗等一系列方面有较大的收获，力图让此项研究成果成为越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块基石，通过此次探索为今后越文化的研究找到新的起点。与此同时，本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模式以及一些有益的经验，甚或进而为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由于选题的内容部分是有交叉的，难免有些重叠；又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每部书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全然一致。我想这样也许有它的好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互相参校，生发出自己的看法。

越文化是一块沃土，我们希望，为了越文化研究的繁荣，为了学术事业的不断创新，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越地学术思想的流变及基本特征 / 1

- 一、传统学术与学术史研究 / 1
- 二、越地学术思想的流变 / 4
- 三、越地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 / 11

第二章 越地经史之学及特色 / 22

- 一、经学传统及其演变脉络 / 22
- 二、越地学者的治经传统 / 29
- 三、从经即史到六经皆史的经史观 / 37

第三章 浙东学派及学术渊源关系 / 43

- 一、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形成及主要成就 / 43
- 二、清初浙东学派的形成及主要成就 / 53
- 三、南宋浙东学派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关系 / 70

第四章 越地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 74

- 一、疾虚妄树异端——越地哲学思想的第一个历史高度 / 74
- 二、由理学到心学——越地哲学思想的第二个历史高度 / 82
- 三、由心学到实学——越地哲学思想的第三个历史高度 / 90

第五章 越地宗教思想的理论贡献 / 104



- 一、于越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 104
- 二、越地佛教的传播及在中国宗教史上的地位 / 106
- 三、越地的道教思想及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 122
- 四、越地文人在儒释道合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 132

第六章 越地伦理思想的流变 / 140

- 一、在道德核心价值观上与中华文化的一致性 / 140
- 二、义利并重是越文化道德追求的重要特色 / 153
- 三、在伦理思想上更加关注道德实践 / 161

第七章 越地教育思想的鲜明个性 / 167

- 一、越地源远流长的重教传统 / 167
- 二、越地教育思想的演变主线 / 173
- 三、越地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影响 / 194

第八章 越地经济思想的传承 / 198

- 一、“农商俱利”的经济思想及影响 / 198
- 二、“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及影响 / 201
- 三、“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及影响 / 217

第九章 越地学术文化的传播 / 224

- 一、学术观点在交锋辩驳中传播 / 224
- 二、思想观念在为官从政中传播 / 230
- 三、理论流派在讲学授徒中传播 / 234
- 四、学术思想传播的其他途径 / 238

第十章 越地学术思想中的思维特点 / 240

- 一、越地学术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依据 / 240
- 二、越地学术思想中突出的务实性思维 / 243
- 三、越地学术思想中一贯的包容性思维 / 247
- 四、越地学术思想中强烈的批判性思维 / 254

主要参考书目 / 260

后 记 / 266



第一章 越地学术思想的流变及基本特征

越地学术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又与整体学术思想的发展历史存在着主干的一致性和区域的特殊性。梳理其大致的流变轨迹,把握其流变的基本特征,对于全面阐述越地学术思想十分必要。

一、传统学术与学术史研究

越地学术思想研究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中国传统学术源远流长,形成了以经学为主干,囊括所有关于社会的、自然的学问体系和研究活动。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出现第一个学术繁荣期以来,二千多年的学术积淀,为后人留下了无比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历史上对这些学术资源的利用,大多从训诂和诠释两个方面展开,而对学术史的研究却明显滞后,直到清末清初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并集中于浙东地区。黄宗羲的巨



著《明儒学案》着重于对学术流变的研究,成为现代意义上进行学术史研究的先导,后经全祖望、章学诚等史学名家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究学术史已经是浙东学派的主要研究方向。

对学术思想研究的渊源,梁启超有过这样的论述: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学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人魏莲陆(一鰲)著《北学海》、汤荆岷(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弼、杨升庵……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①

梁启超对古代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描述了大致的梗概,可以这样说,黄宗羲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明儒学案》,是标志着富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的成熟。

《明儒学案》开始了断代学术史的系统研究,其研究的方法是对有明一代的理学家分别学派,每一学派立一学案,每一学案前有序言,以说明该学派的盛衰传递之迹。全书立17个学案,共62卷,评价了明代202位学者的行状和学说,论述了各派理学的流变和特点。通过这部精心编纂的明代理学史专著,不只可以充分了解黄宗羲的理学观点,“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

全祖望是对“学案”体学术史研究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他通过对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2—263页。

《宋元学案》的续修和完善,增补了原本所无的学案,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1/3;增定序目,精心撰写各学案的《序录》,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修定、次定和补定原本,对原本所有只作增损者,谓之“修定”,凡对原本所有只分其卷第者,谓之“次定”,凡对原本所有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者,则谓之“补定”,考订史实,以补原本之失误和不足。

全祖望对宋元学术史研究的贡献在于,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他精心撰写的百卷《序录》,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一学案的学术特点、学术渊源和学术影响,及案主的立身行事和道德品质,同时,也能使后人窥见不同学派的争鸣态势。他对各派学术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发掘了不少新的文献资料,丰富了对各个学派的认识,并对《宋史》的舛讹和遗漏做了补充、修正。他对“硕儒”、“真儒”、“醇儒”的推崇,提出了心目中的治学楷模。在他看来,能“独探微言”,有所发明创造,非墨守成规者为硕儒;潜心正学,不入异端,不佞佛者为真儒;立身行事恪守儒家的传统道德,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者为醇儒。

王梓材在《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中说:

宋、元儒异于明儒。明儒诸家,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胡瑗〕、泰山〔孙复〕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故明儒学案可以无表,宋元学案不可无表,以揭其流派。^①

北宋学派除了上述所列之外,还有王安石的新学、苏轼和苏辙的蜀学。到南宋发展为朱熹的闽学、张栻的湖湘学,统称为道学,又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婺学、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等等。在南宋,仅有半壁河山,屈居东南一隅,国力贫弱,随时面临着亡国的威胁,但学术思想反而由此繁荣起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在封建社会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时,即史称“治史”或“盛世”时期,在思想学术领域往往难以出现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而在社会矛盾激化,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后,困境迫使一些善于深思的思想家去探索问题、揭露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出现新思想甚至新学派。而南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尖锐激烈,问题充分暴露,使得思想家不得不去深入考虑,思想学

^①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首。

术繁荣也就具有其必然性。

学术史研究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后,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越来越明晰。学术史研究应该侧重于考订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学科意识及其方法与实践,以区别于哲学史对于概念与术语的处理。^①追踪某一学科发展的成长与道路,应该是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衡量其是非价值,也就是从知识增长(学)和方法论(术)的角度来描绘某一学科的发展及建设——这才是学术史所要做的主要内容。

研究传统学术思想,大致存在着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史,侧重于考察不同学科或学派的学术流变;二是论,侧重于分析评价不同学科或学派的内涵、意义。往常讨论学术思想往往是以特定学者或学派作为研究的对象,而要对一个区域的学术思想在阐述其流变的基础上,展开进行分析、评价,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工程。但是古代学术思想的流派,常有强烈的地域性,忽略这一点,即难考镜其源流。^②

以一地域的学术思想发展轨迹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以派、家法、家学为取向的研究,是在考察地域空间内形成的学术思想源流的基础上,着重于探讨这些学术思想丰富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

二、越地学术思想的流变

越地学术,始于汉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个大繁荣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流派此消彼长,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此时的越国刚从子爵小国发展起来,句践时代国力达到顶峰,称霸一时。但从学术文化上考察,主要还停留在讨论治国之术和争霸之谋上,此时越地的学术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范蠡、文种、计然等向越王句践呈述的谋略中。

^① 参见刘墨:《乾嘉学术十论》,三联书店 2006 年版,“自序”。

^② 参见李学勤、江林昌:《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范蠡(约公元前536—448), 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 被誉为“治国良臣, 兵家奇才, 商人始祖”。他的思想和言行, 保存在《国语·越语》、《吴越春秋》中, 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货殖列传》和《越绝书》中也有所记载。他在回答越王句践如何治理国家时, 提出“左道右术, 去末取实”的观点, 同时阐发了自己的天道观, 认为: “道者, 天地先生, 不知老, 曲成万物, 不名巧, 故谓之道。道生气, 气生阴, 阴生阳, 阳生天地。天地立, 然后有寒暑、燥湿、日月、星辰、四时, 而万物备。”^①又说: “天道皇皇, 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 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 阴至而阳。日困而还, 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 因天地之常, 与之俱行。”^②“术者, 天意也。盛夏之时, 万物遂长, 圣人缘天, 心助天喜, 乐万物之长。”^③强调顺着天意, 兼得万物之利, 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所谓末实之分的“末”是“名也。故名过实, 则百姓不附。亲贤士, 不为用, 而外诸侯, 圣主不为也”^④。“实”是“谷也。得人心, 任贤士也”。“田野开辟, 府仓实, 民众殷, 无旷其众, 以为乱梯。”^⑤只有去虚名, 重实业田垦, 才能人心安定, 贤明之士也会来归附, 国家也才能兴旺。

范蠡在谋划如何打败吴国时, 提出了“因阴阳之恒, 顺天地之常”的思想: “四封之外, 敌国之制, 立断之事, 因阴阳之恒, 顺天地之常, 柔而不屈, 强而不刚, 德虐之行, 因以为常, 死生因天地之刑。”强调“时不至, 不可强生; 事不究, 不可强成。自若以处, 以度天下, 待其来者而正之, 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时将反, 事将有间,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 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⑥也就是说能办成大事的人, 就是既能善于利用客观形势, 又能充分发挥主观努力, 把事业搞成功的人。他强调所谓富国强兵之道, 就是能顺应“天道”, 以保持国家的富强(持盈), 效法“人道”, 以安危机的局势(定倾), 因循“地道”, 以调节好政治事务(节事)。认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是相辅相成, 互为条件的。

① 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十三。

② 左丘明:《国语·越语》。

③ 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十三。

④ 同上。

⑤ 左丘明:《国语·越语》。

⑥ 同上。



文种(?—前472) 越国著名的谋略家,是以向越王献灭吴九术并亲自谋划实践而著名的。《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云:“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恒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于脱履。”所谓“九术”:

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赂以喜其臣。三曰贵余粟槁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曰遗之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术,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

句践采纳实施其中部分之谋术,实现了其称霸的梦想,也为文种在功成名就后的被除留下了后患。

在对敌国交往中的重谋与在治理内政中重德是构成文种思想的两个侧面。他在治国理政中强调“尚贤”与“尚同”。所谓“尚贤”就是国王、大臣要推荐好人,把重要位置让给好人,做到“选贤与能”。所谓“尚同”是包括天子、各级官吏和管事者的意志应该相同,而不应该相异。这种经世之学对后世的政治伦理有着很大的影响。

计然(倪)生卒年份不详,范蠡之师,著名谋略家,他的经济思想对越地后人的影响更是深远。《越绝书·计倪内经》载:“计倪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后定居越国,帮助句践兴越灭吴,主持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为越国制定了一套兴农利商的政策,以“农末俱利”、“货物官市”为基本国策,对经济施行价格调控,如把米谷蔬果定为十等,按质论价,公平交易,因而“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

越国时期特别是句践争霸年代一批杰出人物的思想的形成不同于中原诸子百家,他们主要是围绕治国之方略、争霸之谋术展开的,是在为论证自己的方略和谋术的正确性寻找依据,往往缺乏系统性。其影响也是依靠治国和争霸的成功震慑各方,不同于中原诸子百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游说于朝野,以其理论的说服力打动各方。严格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地尚未形成学术探讨的氛围。

说越地学术始于汉代,是因为此时,会稽郡士人著书立说之风兴起。西汉,学术著述的重点在太湖流域。东汉以来钱塘江南岸山阴——上虞——余姚——句章一线,是当时会稽郡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士人著书立

说在这一线兴起。东汉初年成书的有《越绝书》，会稽人吴君高著有《越绝书》，周长生著有《洞历》。山阴人赵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等。特别是王充的《论衡》、《讥笑俗》、《政务》、《养性》等著述的完成，并在中原逐步开始传播其理论，引起朝野士人的震动，构成了越地学术活动的第一个高台。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界，截然不同于两汉时期的经学兴盛，崇尚的主要是《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学说，追求玄远，崇尚自然，注重超然的思辨、经典的义理而又不求甚解。以何晏、王弼开其端，提出“以无为本”、“得意忘象”，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倡导谈玄析理，放达不羁。以手握尘尾、聚相论辩为“玄妙”、“旷达”。因为兴起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故史称这种清谈为“正始之音”。玄学的出现促进了道教思想的极大发展，逐步实现了佛教与中国儒、道的结合，表现出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对隋唐乃至宋明思想的影响极其重大。

在魏晋清谈者中，嵇康和阮籍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相当巨大。但就思想学术成就而言，嵇康要略胜阮籍一筹，即使当时以注《庄子》闻名的向秀也难以比拟。嵇康在钟会的眼中是：“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孝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①对嵇康、阮籍在玄学中的地位作用，任继愈、余敦康有过这样的评说：

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结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頠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思潮的合题。……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在玄学思潮的这个发展序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裴頠的崇有论与其说是针对着何晏、王弼，倒不如说是直接受到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

^① 《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